

《国语》作者、成书时代考论

戎辉兵*

[摘要]《国语》作者、成书时代问题久有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自汉迄今各种意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国语》的作者是否是左丘明,二、《国语》的成书时代。笔者通过对前人意见、《国语》及与之相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考辨,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成书时代大致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的汉魏旧说应该是可信的。

[关键词]《国语》;作者;成书时代

《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义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①,与《左传》以《春秋》内、外传并称。^②但历代学者对其重视程度,不可与《左传》相提并论。汉魏时期几位学者给《国语》作过注解,清人作过校诂之类的工作,但对其作者、成书时代等问题未作深入探讨。《国语》与《左传》关系密切,《国语》作者、成书时代问题久有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自汉迄今各种意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国语》的作者是否是左丘明,二、《国语》的成书时代。笔者认为,这两方面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国语》的作者是否是左丘明。下面就这两方面问题分别讨论。^③因这类问题纷繁复杂、头绪众多,且囿于学力、识断、材料,笔者所作的论断也只是一些简要的倾向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国语》的作者

现将历代学者的主要不同意见综述如下:

一、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皆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④班固《汉书·艺文

*文学博士,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学系副教授,210038。

①韦昭:《国语解叙》,《国语集解·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96页。

②《隋书·经籍志》即作:“春秋外传国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2页。

③《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刘向、刘歆、桓谭、班固以及汉魏学者都深信不疑。唐宋以后,赵匡、程颐、朱熹、郑樵等先后对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赵生群师在其《春秋经传研究》一书中,通过大量内证的发掘及相关文献的统计、勘比、考证,认为《左传》的作者是鲁人左丘明,《左传》是《春秋》之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因为其方法科学、考证严密,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李学勤先生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还说:“《左传》的真伪问题,经过中外学者多年的讨论辨析,今天已趋于澄清,没有多少人怀疑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④宋人叶梦得、今人王树民等认为:左丘非左丘明,左丘与左丘明为两人,而非一人。

志》：“《国语》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左丘明著。”《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①刘歆引《国语》，而称其为《春秋外传》。《汉书·韦贤传》：“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②范曄《后汉书·班彪列传》：“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梲杙》之事遂闕，而《左氏》、《国语》独章。”^③王充《论衡·案书篇》：“《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④刘熙《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⑤王先谦《疏证补》：“毕沅曰：‘《说文》引《国语》文辄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王启原曰：‘《说文》及《风俗通》并称《春秋国语》，至《释名》则言‘又曰《外传》’。盖汉时二名并称。’《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是《外传》之名已旧，不得以《汉志》无《外传》之名而疑之。惟其为《春秋外传》，故《蜀志·陈震传》：‘震即以《国语》为《春秋》也。’苏舆曰：‘《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此旧以《国语》为《外传》之证。”^⑥韦昭《国语解叙》：“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摭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⑦孔晁亦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辞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⑧刘知几《史通·六家》：“《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于《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⑨

二、认为《国语》的作者不是左丘明。

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主要依据大致如下：

首先，认为《国语》与《左传》在编撰体例、行文风格、思想倾向以及相同历史事件说法等方面差别明显，不似一人手笔。首发难者晋人傅玄认为：“《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⑩后来者隋人刘炫亦据上述同类现象再次论定《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刘炫以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为有此类往往与《左传》不同故也。”^⑪柳宗元也说：“《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⑫赵匡、啖助、陆淳、陈振孙等亦因《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序事乖刺之由而持是说。^⑬

其次，从《国语》记述的内容来看，有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发生在与孔子大体同时的左丘明在

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②班固：《汉书·韦贤传》，第3129页。

③范曄：《后汉书·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④王充：《论衡·案书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77页。

⑤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13页。

⑥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313页。

⑦韦昭：《国语解叙》，《国语集解·附录》，第596页。

⑧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1页。

⑨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0页。

⑩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三年》“乃先晋人”句下引傅玄云，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171页。

⑪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栾、范易行以诱之”句下，第1992页。

⑫柳宗元：《非国语》，《柳宗元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28页。

⑬赵匡、啖助、陆淳之说，见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2—386页。陈振孙说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自班固志《艺文》，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所著，至今与《春秋传》并行，号为《外传》。今考二书，虽相出入，而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马子长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似不知所谓。唐啖助亦尝辨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世时段之后。中华书局本《国语集解》点校者之一的沈长云先生认为：“如《晋语》谈到智伯之亡（在前453年，上距孔子卒已二十六年），谈到赵襄子的谥号（襄子卒在前425年，上距孔子卒已五十四年）就不是左丘明所能了解到的。《国语》中也有一些预言或占卜之类，如《晋语四》中的姜戎之语‘商之享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表明《国语》之作必在晋亡以后，晋亡于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年（前376年），当然不可能为左丘明所及。^①在典章制度方面，如《周语中》提到的畿服及五等爵制；《鲁语下》提到的‘三公九卿’、《晋语四》提到的‘将军’；……都不应存在于春秋时代。……因此，把《国语》归于左丘明所作，对于《国语》本身就是无法说通的。”^②

再次，宋人叶梦得认为：“（孔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其说本于司马迁，固以丘明为名，则左为氏矣。然迁复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按《姓谱》有左氏、有左丘氏。迁以左丘为氏，则传安得名左氏耶？”^③其后王应麟重申之：“叶少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④中华书局本《国语集解》点校者之一的王树民先生也认为《国语》与《左传》的作者是两个人：一是左丘，一是左丘明。^⑤后世学者认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之依据无外乎上述几点。

笔者意见是倾向汉魏的传统说法，即《国语》与《左传》同为左丘明所作。

首先，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主要依据经不起推敲，似是而非，不足为据。

一、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国语》与《左传》在编撰体例、行文风格、思想倾向以及相同历史事件说法等方面差别明显，不似一人手笔。就此，宋人已有解释。司马光转述其父意见：“先儒多怪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为之说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为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辞语繁重，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迥峻也，又多驳杂不粹之义。诚由列国之史，学有厚薄，才有深浅，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重复之书何为耶？”^⑥李焘亦有此相同意见：“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

^①《晋语四》：“商之享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笔者认为这段文字非常可能就是当时（骊姬乱晋）人们根据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对晋所作的预判，从而得出晋“今未半也”的结论，不一定是在晋亡之后所说。所以这一材料不能表明《国语》之作必在晋亡以后。

^②沈长云：《〈国语〉编撰考》，《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③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49册，第291—292页。

^④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九，第1071页。

^⑤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一文云：“《国语》的编定者，《史记》和《汉书》的说法不同，《史记》说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则称‘左丘明著’。与《国语》相近的《左氏春秋》，《史记》说是‘鲁君子左丘明’所作；《汉书》作《左氏传》，说是‘鲁太史左丘明’作。《国语》和《左氏春秋》既有相近的一面，从班固以后，也就以作者为一人，甚至左丘明也被说成为一个失明的人，因而有‘盲左’之称。其实编定不同于写作，编定是编辑故有之文，虽失明者亦不难就其诵习与记忆者而编定之，写作便不能这样容易了。可知编定《国语》与写成《左氏春秋》的本来是两个人，司马迁说得很明白，一个是左丘，一个是左丘明；不过他们的事迹为后人所知者极少，其名又相近，因而被混同为一个人了。左丘明见于《论语》，为孔子所称。司马迁也称他为‘鲁君子’，其为鲁人，应无问题。左丘之事，惟见司马迁所述：‘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以这些人不幸遭耻辱而在事业上皆有以自现，比喻他自己为完成著史大业而不避耻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列举的这几个人大致以时间先后为次序，左丘列于屈原与孙子之间，说明其时代约略相近，正在战国中期。按《国语》二十一篇，而《晋语》独占九篇，在晋国三卿中，又多记赵氏之事，说明左丘应为赵国人，或与赵接近之人。”（《文史》，第二十五辑，第128页）王先生在这段文字中明确就《国语》作者问题表明其意见：《国语》作者是战国中期赵国人、或与赵接近之人左丘。

^⑥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九，第1071页。

公父子能识之。”^①虽然笔者对司马光、李焘关于《左传》、《国语》成书先后问题持不同意见,但对他们关于《左传》《国语》的史料来源、《左传》编撰过程及《左传》《国语》二书在编撰体例、行文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差异形成的解说符合事理而基本认同。“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左丘明作《左传》是根据各国史料依经(《春秋》)立传,以年叙事解经,其选择的材料当然是以“圣人(孔子)之是非”为标准;而《国语》只是将作《春秋传》(即《左传》)的剩余史料以国为别,论次编辑成书。因为是论次编辑,原始史料的一些痕迹就不可避免地保存下来;加之原始史料来源于各国,各国史官的行文风格、思想倾向不尽相同,所以《国语》中存在与《左传》编撰体例、行文风格、思想倾向等差异,也很自然。^②对于《国语》与《左传》同一历史事件而说法不一的问题,傅玄就认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后来者隋人刘炫亦据上述同类现象再次论定《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刘炫也以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为有此类往往与《左传》不同故也。”这些实际上也不能成为否认《国语》与《左传》为左丘明一人所作的理由。《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就有针对性地辩驳:“(《国语》)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抵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③上述情况在《史记》中也存在。“其实他们所指‘抵牾’之处,有不少都是因为作者所见材料互异,疑莫能明,或者虽有主见,而不愿断然取舍,故疑以传疑,各存其旧,留待后人抉择判断。这是对待史料的一种极其慎重的方法。”^④

二、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另一主要依据就是从《国语》记述的内容来看,有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发生在与孔子大体同时的左丘明在世时段之后。“大抵古人之治学也,本以道术为公器,其断限不严,故先师之所作,与后师之所述,杂糅而不分……果其学有师承,则述与作同功,笔与口并用。传之既久,家法浸亡,依托之说,窜乱之文,相次搀入。”^⑤先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多为辗转传抄或口耳相传,所以后人增损改动、附益依托之事不可避免且时有发生。对此,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一些后人改动、附益的文字,来判定一书的最初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时代。这类问题《左传》也同样存在。赵生群师在《〈春秋〉经传研究》一书中对此已有辩驳。^⑥

三、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另一依据,就是由叶梦得提出的“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殊不知古人有时因出于句式整齐或行文方便等考虑,在称述姓氏、姓名时常有省略。^⑦如古人在称司马迁时常简称“马迁”,《广韵·陆法言〈切韵〉序》:“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⑧《史通·六家》:“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⑨“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⑩在称其姓氏司马时常简称“马”,如《史通·六家》:“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⑪又宋人娄机撰有字书,曰《班马字类》。单从字面来看,司马、马显然是不同的姓氏,司马迁、马迁也是不同的

①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九,第1071页。

②就文风而言,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范宁云‘左氏艳而富’,韩愈云‘左氏浮夸’,今观此书,信乎其富艳且浮夸也,非左氏而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③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60页。

④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⑤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余嘉锡说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7—248页。

⑥详见赵生群师《〈春秋〉经传研究》第二章“《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第三节“关于《左传》的作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2—78页。

⑦蒙施谢捷师告知,即便战国秦汉玺印,亦有姓氏、名字省略情况:如姓氏“皇父”简称“皇”,名“冬(终)古”简称“古”。

⑧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⑨浦起龙:《史通通释》,第6页。

⑩浦起龙:《史通通释》,第15页。

⑪浦起龙:《史通通释》,第11页。

姓名。看到上文所举实例中的“马迁”、“马”，我们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其所指就是太史公司马迁。所以认为左丘不是左丘明，并据此认定《国语》的作者是左丘而不是左丘明之人大概是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的存在。

其次，我们从《国语》一书本身可以看出其与《左传》的关系密切。

一、尊周宗鲁的思想倾向。

平王东迁、春秋以来，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僭越，五霸迭兴。孔子有鉴于此，而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当时虽然周室衰微，但天子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孔子认为礼制、名份是统治秩序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根据鲁史记作《春秋》时，“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③加之孔子又是鲁人，所以其思想倾向当然尊周宗鲁。为《春秋》作《传》的鲁君子左丘明与孔子大体同时或稍晚，其与孔子关系密切且思想倾向与孔子一致，《汉书·艺文志》：“（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④杜预《春秋序》也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⑤所以，左丘明作《左传》也是承孔子而尊周宗鲁。

尊周宗鲁这一倾向在《国语》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一，《国语》八《语》的排列顺序就很清楚地表明这一倾向。《国语》二十一卷，其八《语》顺序与具体卷数如下：《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因作者尊周宗鲁，故此《周语》、《鲁语》排第一、二位非常自然，尽管《鲁语》所载颇为琐屑细碎。《齐语》第三也是因其对周王室有夹辅尊崇之功。《鲁语上》即有：“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左传·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桓公时，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语》有：“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晋语》之所以排在第四，是因为晋之始封唐叔在周开国之后，但历代晋侯对周王室亦有夹辅之功。《周语中》：“凡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晋语四》：“（郑）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史记·周本纪》：“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汜。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黜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周语上》：“二十一年，以诸侯朝王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郑语》第五的缘由大致与上之《晋语》同。如《周语中》：“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然晋、郑二国强弱不等，对春秋时局影响不同，故排序有先后，文字有多寡。其后之楚、吴、越皆僭越之国，其国君无视周王室存在而称“王”，故其序靠后。盖因其国力之大小强弱及对其时时局影响，而列《楚语》、《吴语》、《越语》之序。

第二，《国语》的具体内容也表现出尊崇周王室的思想倾向。如《周语上》：“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夫执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贄无镇，诬王无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又云：“襄王使太宰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7页。

②《论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503—2504页。

③杜预：《春秋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705页。

④班固：《汉书》，第1715页。

⑤杜预：《春秋序》，第1705页。

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飧、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民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作者将惠、文二公两相对照，去就取舍自明。又《吴语》：“晋乃令董褐复命曰：‘寡君未敢观兵身见，使褐复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诸侯大夫失礼于天子，请贞于阳卜，收文、武之诸侯。孤以下密迩于天子，无所逃罪，讯让日至，曰：昔吴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诸侯以顾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蛮、荆之虞，礼世不续，用命孤礼佐周公，以见我一二兄弟之国，以休君忧。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此类之例甚夥，不烦援引。

二、“君子曰”的行文标志。

《左传》常常在一段叙事文字之后，用“君子曰”或“君子谓”之言来表达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议。^①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十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君子谓”有时又作“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君子以”等。这类现象在《国语·晋语》中时常可见。因为《国语》主要是“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所以其大部分都是记言文字。记言文字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的好恶取舍、价值评判，也就无需再通过“君子曰”来表明态度。而《晋语》和《国语》其他部分不太一样，是以记事为主，所以作者在一段记事文字之后，以“君子曰”的方式表达对这一事件的评判。

《晋语》“君子曰”共出现九次：《晋语一》四次，《晋语二》两次，《晋语四》一次，《晋语六》一次，《晋语七》一次。就以《晋语一》四条和《晋语二》一条“君子曰”为例，来看其评判的标准和口吻。《晋语一》：“史苏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乱本生矣！日，君以骊姬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恶其贪，则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强其毒，民疾其态，其乱生矣！吾闻君之好好而恶恶，乐乐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畜其子，又从其欲，子思报父之耻而信其欲，虽好色，必恶心，不可谓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难本矣。’”《晋语一》：“是故使申生伐东山，衣之偏裋之衣，佩以金玦。仆人赞闻之，曰：‘太子殆矣！君赐之奇，奇生怪，怪生无常，无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观之，故告之以离心，而示之以坚忍之权，则必恶其心而害其身矣。恶其心，必内险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难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尽敌而反。”虽尽敌，其若内谗何！’申生胜狄而反，谗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释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可对曰：‘非故也。君行，

^①关于《左传》“君子曰”，可参见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论《左传》非后人所附益”、“再论《左传》非后人所附益”二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太子居，以监国也；君行，太子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闻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钧以年，年同以爱，爱疑决之以卜筮。子无谋吾父子之间，吾以此观之。’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惧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惧！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得。且吾闻之曰：“敬贤于请。”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晋语一》：“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突闻之：“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適（嫡）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远于死，惠于众而利社稷，其可以图之乎？况其危身于狄，以起谗于内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是故赐我奇服，而告我权。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潜在中矣，君故生心。虽蝎潜，焉避之？不若战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废，焉用死？’荀息曰：‘昔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君曰：“何谓也？”我对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之，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媿，贞也。”吾言既往矣，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虽死，焉避之？’……于是杀奚齐、卓子与骀姬，而请君于秦。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左传·僖公九年》作：“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可见《国语》的“君子曰”评判标准与《左传》一样，无外乎仁义礼智信。

这些虽然不足以说明《左传》《国语》两书为同一人所作，但最起码能说明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写作习惯：喜欢在自己的著述里加上按语或评语，而且二者的口吻、评判标准也相当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二书的密切关系。

既然否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的主要依据经不起推敲，似是而非，不足为据，而且从《国语》一书本身可以看出其与《左传》的密切关系，所以汉魏的传统说法，即《国语》与《左传》同为左丘明所作应该还是可信的。

二、《国语》的成书时代

既然通过上文说明《国语》与《左传》同为左丘明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的可信性，那么《国语》一书的成书年代，也就不难大致确定：成书年代就是左丘明的生活年代。左丘明与孔子大致同时而或稍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①《汉书·艺文志》和宋人李焘亦有类似论断，如前所述，兹不赘言。^②若按司马光、班固、李焘所说，作为资料长编的《国语》在前，而《左传》在后，那为何见于《左传》的许多内容，反而不见于作为资料长编的《国语》？左丘明作《左传》是据各国史料依经（《春秋》）立传，以年叙事解经，其选择的材料当然是以“圣人（孔子）之是非”为标准；而《国语》只是将作《春秋传》（即《左传》）的剩余史料以国为别，论次编辑成书。所以二书的成书先后应该是《左传》在前，而《国语》在后。^③

^①司马迁：《史记》，第509—510页。

^②班固：《汉书》，第1715页；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九，第1071页。

^③关于这一点，张心澂在《伪书通考》的杂史类《国语》下的按语中也有论述。详见《伪书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36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戾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①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这段文字颇有疑义，认为其中有些先后问题与史实不符，如“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但是“昔西伯拘羑里”“孔子戾陈蔡”“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等，当确为史实无疑。有关《国语》，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三点：一、《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这点显而易见。二、左丘明原本不是失明之人，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其失明。西伯不是生来就拘羑里，孔子也不是生来就戾陈蔡，屈原也不是生来就遭放逐，孙子不是生来就被膑脚……，他们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有如此不幸遭遇。《汉书·艺文志》：“（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观其史记”，足以说明左氏作《左传》时尚未失明。不然，何以能“观”？左丘失明，也应当是后来之事。三、《国语》作于左丘明失明之后。左丘明作《左传》，而古人从未有提及失明之事。作《左传》时尚能“观其史记”，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失明之前，《国语》作于失明之后。章太炎在《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也说：“《国语》之成，更在毫期，故韦昭言，‘雅思未尽’，复为《国语》。太史公于左氏成《春秋》不言失明，于其成《国语》则谓在失明后，是作书之次第之可知者。”^②《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③司马贞《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⑤司马贞《索隐》：“若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经传》生年不定，使孔子寿数不明。”^⑥孔子生卒年为公元前552或551年至公元前479年，而左丘明与孔子大致同时或稍晚，所以，《国语》一书的成书时代大致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

1987年，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断裂错位现象十分严重。共有残简4371段，保存最长者36cm，短者不足1cm，估计整筒长45cm，数量约1000支，字数共约21000多字。后经统计，筒头817枚，筒头筒尾难于分辨者27枚。据同出器物的特征分析，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墓主人身份，据其规模形制、历年楚墓的发掘和研究及《礼记》等记载推测，当为士一级。目前慈利竹书与《国语·吴语》相关的简文只有零星发表，部分有图片，见《文物》1990年第10期图版柒、《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图版陆。竹简内容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传世文献可资对勘的，如《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一类是《管子》、《宁越子》等书的佚文或古佚书。^⑦文字与《国语·吴语》相关的简文，其内容基本见于今本《吴语》，也有部分简文不见于《吴语》，但其文字内容与《吴语》非常密切，行文风格也相当接近，有可能是《吴语》的佚文。^⑧虽然我们还不能认为这批与《吴语》内容相关的慈利楚简就是《国语·吴语》，但是可以据此推测，慈利楚简之类与《国语》关系密切的书在战国早、中期的楚地流布很广。

孔颖达《春秋左传序正义》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①司马迁：《史记》，第3300页。

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六册）“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页。

③司马迁：《史记》，第1905页。

④司马迁：《史记》，第1906页。

⑤司马迁：《史记》，第1945页。

⑥司马迁：《史记》，第1945页。

⑦详情见《湖南省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南省慈利石板村号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⑧《国语》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其部分内容有亡佚，董增龄在《春秋公羊传疏》、《史记》三家注、《礼记》疏、《文选》注中已发现六朝隋唐人所引《国语》，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详见董增龄《国语正义序》（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

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③楚悼王至楚威王的年代是公元前401年—前328年的战国早、中期,吴起、铎椒皆左氏学之传人,他们当时在楚国的地位一相一傅,所以左氏之学在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地流行,就很自然。

慈利楚简之类与《国语》关系密切的书,在战国早、中期的楚地流传较广,而当时左氏之学在楚地较为流行,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关联的。《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而慈利楚简中有关《国语·吴语》的部分与《国语》关系密切;文字与《国语·吴语》相关的简文,其内容基本见于今本《吴语》,也有部分简文不见于《吴语》,但其文字内容与《吴语》非常密切,行文风格也相当接近。所以极有可能是《国语》的古抄本之一。因为左氏之学战国早期至中期在楚地流行,所以左氏之书在其时其地流传较广就很自然。^④尽管这些也只是在目前掌握材料基础上所作的推测,但是它对我们了解《国语》一书的作者是左丘明和成书年代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沈长云先生认为“《国语》成书在战国晚期,并很可能出自三晋人之手”的结论,谭家健先生认为“《国语》成书当在《左传》稍前,……其人可能是三晋史官”的结论,现在看来,都不可信。^⑤

由唐宋以来直至近代的疑古风潮,自有其学术史背景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⑥但其怀疑的依据往往仅就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没有考虑到怀疑对象与其他相关文献的关系以及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情况。而汉魏以来的传统说法由于去古未远,当时学者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随历史变迁散佚失传,尤其东汉至隋,书经五厄,古书日亡,汉魏时尚存世的不少文献后世学者无从得见。但随着传世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地下文献的陆续出土,疑古辨伪结论逐渐被推翻,而汉魏旧说也不断被证实。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加之上文的一些考辨及相关文献的出土,我们认为《国语》作者、成书时代的汉魏旧说应该还是可信的。

(责任编辑:高峰)

An Examination of *Guoyu*: Its Authorship and Time of Completion

RONG Hui-bing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over the issues as to who was the author of *Guoyu* (usu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Discourses of the States*) and when it was completed. After reviewing the different opinions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examining this ancient book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proposed by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is reasonable that it was authored by Zuo Qiuming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years and befor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Guoyu*; authorship; time of completion

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703页。

②司马迁:《史记》,第2196页。

③司马迁:《史记》,第510页。

④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暂定名为《春秋事语》部分,所记之事,基本上见于《春秋》传及《国语》,也可以说明左氏之学在战国时期楚地的流传情况。详见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裘锡圭:《帛书〈春秋事语〉校读》(《湖南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⑤详见沈长云:《〈国语〉编撰考》,《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谭家健:《关于〈国语〉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⑥疑古,此处指对先秦两汉古籍的撰人、时代及真伪持怀疑态度的辨伪一派。